

移建文昌宮

——清代雲南東川府的景觀再造與空間爭奪

黃菲

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

香港科技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提要

作為較晚納入帝國體系的土著聚居區之一，雲南東川府在清初經歷重要轉變。清帝國強制推行改土歸流後，原有的景觀格局被自詡代表帝國的地方官員和文人菁英改寫。不過，在各方群體和族群的互動中，新舊景觀和信仰空間之間往往彼此交迭，呈現出相互競爭的空間詮釋。本文以清代東川府移建文昌宮為例，展現地方文運建築如何被各類群體再造的歷史過程。這類全新的禮儀空間和景觀被官方菁英修建者們建造，但生活在其中的各方人群因其各異的社會經濟背景，對地方景觀與信念空間保有各自的日常經驗與歷史記憶。進而呈現在官方菁英版本之外，清代東川府中各方在地群體對地方景觀與信念空間的不同解讀與形塑過程。

關鍵詞：東川府、文昌宮、改土歸流、景觀

黃菲，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廣州市新港西路135號，郵政編碼：510275；香港科技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香港九龍清水灣道，電郵：faye712@gmail.com。

本文得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重大研究項目「明清帝國的建構與西南土著社會演變」（項目編號：11240-3191011）及中華人民共和國2007年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清代銅鉛礦業與西南民族地區的開發」（項目編號：07BZS042）的資助。筆者由衷感謝兩位匿名評審人的寶貴意見。本文改寫自筆者博士論文第五章，參見 Fei Huang, *Landscape Practices and Representations in Eighteenth-Century Dongchuan, Southwest China* (Leiden: Leiden University, unpublished Ph. D. dissertation, 2012)。本文寫作過程中得到田海 (Barend ter Haar)、魏捷茲 (James R. Wilkerson)、劉志偉、徐堅、溫春來、馬健雄等諸位教授的鼓勵和建議；田野資料收集工作得到雲南省曲靖市會澤縣各單位的支持和幫助，尤其是會澤縣委宣傳部周朝祥、會澤縣文物管理所所長王良中，以及會澤縣卞伯澤、馮德聰、陸子斌、楊金全諸位先生，在此一併特別致謝。

一、前言

清代東川府位於雲南東北部與貴州、四川交界處，其區域包括當今雲南省會澤縣、巧家縣、昆明市東川區一帶，府治設於會澤縣。（附圖1）此地由土酋勢力控制並保持相對獨立，是長期脫離帝國有效統治的高山地帶。至18世紀，清王朝決意以武力強制改土歸流，隨即展開銅礦開採以及滇銅京運。這處從前遠在帝國視野之外的邊陲之地，此刻與帝國中心之間構成緊密關聯。東川府在銅礦開採以及滇銅京運中的經濟角色，已有不少經濟史方面的相關研究，但學界對此時巨變的東川地方社會卻鮮有深入考察。^① 作為新近納入清帝國疆域並與帝國經濟命脈密切相關的地域，東川府所在的地方社會在政治、經濟以及文化上皆出現重要轉變。這處曾經的窮山惡水之地，在當時地方官員和文人菁英的論述中轉變為「滇省上游之望郡」。^② 本文以清初東川府文昌宮移建為個案，探討在巨大社會經濟變動背景下新舊城市景觀的轉變以及各類地方群體對此的建構和解讀。

過去數十年來，中國城市史研究大多集中於帝國政治經濟中心，諸如北

① 自18世紀，滇銅取代從日本進口的洋銅，成為中國銅材市場特別是用於鑄幣的銅材的主要來源。而東川府等滇東北地區具有豐富的銅礦出產量，在巔峰期即成為清帝國最為仰賴的銅礦產地之一。嚴中平編著，《清代雲南銅政考》（上海：中華書局，1948）；邱澎生，〈十八世紀滇銅市場中的官商關係與利益觀念〉，《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72本，第1分（2001年3月），頁49-119；中嶋敏，〈清朝の銅政における洋銅と滇銅〉，《東洋史學論集：宋代史研究とその周邊》（東京：汲古書院，1988），頁161-177；川勝守，〈清、乾隆期雲南銅の京運問題〉，《明清貢納制と巨大都市連鎖——長江と大運河》（東京：汲古書院，2009），頁526-629；Hans Ulrich Vogel, *Chinese Central Monetary Policy and the Yunnan Copper Mining Industry in the Early Qing (1644-1800)* (Zurich: University of Zurich, unpublished Ph. D. dissertation, 1983); Helen Dunstan, "Safely Supping with the Devil: The Qing State and Its Merchant Suppliers of Copper," *Late Imperial China*, 13: 2 (1992): 42-81; Thomas Hirzel and Nanny Kim eds., *Metals, Monies, and Markets in Early Modern Societies: East Asian and Global Perspectives* (Berlin: Lit Verlag Dr. W. Hopf, 2008)。

② 廖瑛，〈東川府志書序〉，載乾隆《東川府志》（《中國西南文獻叢書·西南稀見方志文獻》第26卷，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2003年據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原刊、光緒三十四年〔1908〕東川師範學堂重印本影印），卷首，〈序〉，頁2。

京、西安、洛陽^③，或者江南地區和上海、蘇州、杭州等地^④，然而對位於帝國邊緣西南地域的城市景觀研究則尤為缺失。中央王朝通過建設城市景觀以經略邊遠之地，是西南地區城市景觀規劃的重要面向，其中近期重要的相關研究來自 Patterson C. Giersch 對滇南邊地市鎮的考察。Giersch 以清代滇南威遠府為個案，分析西南邊陲城市中的各類建築空間分佈。他特別指出文昌宮在威遠城中的修建，體現出中央王朝試圖在當地建立文明制度的企圖。同時，在各類官方建築之外，威遠府的傣族寺廟亦並未被拆除，而是與之共處在同一城市空間當中。因而他認為作為「中間場域」(middle ground)的邊境城市，城市空間對於各類相對應的群體而言，是一個角力、溝通和妥協的空間。^⑤

不過，城市建築空間的意涵並非一成不變，其本身在不同情境下會呈現多重複雜內容。受到景觀學(landscape study)相關討論的啟發，本文認為針對西南城市景觀發展中的不同建築空間的分佈，應當進一步探討在具體情境下的社會群體對其的解讀和操弄。景觀學作為一種相對獨立的研究取徑肇始於20世紀中葉，其后的發展匯聚了文化地理學、人類學、考古學、社會學、歷

③ 李孝悌編，《中國的城市生活》（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5）；Thomas Thilo, *Chang'an: Metropole Ostasiens und Weltstadt des Mittelalters, 583-904, Teil 1, Die Stadtanlage*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1997); Teil 2, *Gesellschaft und Kultur*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2006); Susan Naquin, *Peking: Temples and City Life, 1400-190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Victor Xiong, *Sui-Tang Chang'an: A Study in the Urban History of Late Medieval China*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2000); Nancy Shatzman Steinhardt, *Chinese Imperial City Planning*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0)。

④ 關於明清江南市鎮研究，諸如傅衣凌、王家範、樊樹志、范金民等學者的研究相當深入。其考察對象涉及到城市生活中的商業市場、生活方式、會館公所等。有關研究之綜述詳見熊月之、張生，〈中國城市史研究綜述（1986-2006）〉，《史林》（上海），2008年，第1期，頁21-35。Linda Cooke Johnson ed., *Cities of Jiangna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3); Antonia Finnane, *Speaking of Yangzhou: A Chinese City, 1550-1850*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4); Xu Yinong, *The Chinese City in Space and Time: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Form in Suzhou*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0); Michael Marmé, *Suzhou: Where the Goods of All the Provinces Converg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⑤ C. Pat Giersch, "A Motley Throng: Social Change on Southwest China's Early Modern Frontier, 1700-1880",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0: 1 (2001): 67-94; C. Patterson Giersch, *Asian Borderlands: The Transformation of Qing China's Yunnan Frontier*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127-158. 此外，本文所關注的近年有關清代西

史學、藝術史等各類學科對景觀的交叉研究關注。相關學者注重景觀本身的主體性，探討其所蘊含的社會與文化特性，而不是僅將其視為客觀的背景式的舞臺。基於此，景觀不僅是實體的物質性建築過程，更為重要的是存在於各種論說話語當中，並在不同話語中呈現為一種被爭奪的社會文化的產物。這類由人類構建的、觀看的、操作的並生活在其中的景觀，也如同文本、語言一樣，是一種重要的文化表達和記錄的方式。^⑥

景觀學強調無論是圖像上還是語言文字上對於景觀的描述，都是人們對他們所感知到的景觀的一種再現和想象，充斥各種社會文化的象征性暗示和表達自身歷史的手段。^⑦換言之，呈現為各類看似客觀而自然的景觀，實則包含着文化建構的歷史，在其形式與內容下潛藏着主觀的意識形態。此外，對於景觀的分析不僅停留在「觀看式的」單一視角和靜態的基礎上，而要在動態過程中把握景觀作為各種社會話語競逐場域的特性。景觀是我們生活在其中並被我們熟知和體驗的世界，因此景觀不僅是「如畫的」，更是「景中

南研究的成果，除承襲帝國經營地方社會的這一視角之外，更重要的是從西南土著的視角展示改土歸流前後的地方社會文化，如 John E. Herman, *Amid the Clouds and Mist: China's Colonization of Guizhou, 1200-1700*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7); Laura Hostetler, *Qing Colonial Enterprise: Ethnography and Cartography in Early Modern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C. Patterson Giersch, *Asian Borderlands: The Transformation of Qing China's Yunnan Frontier*; James C. Scott, *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9); 溫春來，《從「異域」到「舊疆」：宋至清貴州西北部地區的制度、開發與認同》（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馬健雄，〈哀牢山腹地的族群政治——清中前期的「改土歸流」與「倮黑」的興起〉，《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78本，第3分（2007年9月），頁553-602。

⑥ 參見 Alan R. H. Baker, *Geography and History: Bridging the Divid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109-148; Denis E. Cosgrove, *Social Formation and Symbolic Landscape* (Madiso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4); Denis E. Cosgrove and Stephen Daniels eds., *The Iconography of Landsca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Tim Ingold, *The Perception of the Environment: Essays on Livelihood, Dwelling and Skill* (London: Routledge, 2000), 199-208; Barbara Bender ed., *Landscape: Politics and Perspectives* (London: Berg Publishers, 1993)。此外，“landscape”的中文翻譯有「景觀」、「風景」或「地景」。筆者認為，較之「風景」或「地景」，「景觀」中因「觀」字的引入，包含了主觀感受的意味，更為符合“landscape study”的主旨。因此本文採納「景觀」一詞。

⑦ Denis E. Cosgrove, *Social Formation and Symbolic Landscape*; Denis E. Cosgrove and Stephen Daniels eds., *The Iconography of Landscape*.

有人，人中有景」的。景觀從而並非僅是固定的、靜態的觀察對象，它總是「暫時性的」，從未被完全「建造」好的，永遠處在不斷的建構過程中，隨着日常生活、社會文化與記憶機制而不停變動。景觀沒有絕對呈現，只能被視為一個相對的「文化過程」。景觀是被人們在日常生活的各類實踐中有意識或無意識地創造出來的，它可被視為人活動的連續記錄，並呈現出開放式的狀態，使不同人群可以參與其中並被不斷賦予自己的權力加以改造。^⑧ 因此景觀也是一種連結過去與當下的情感結構，對於不同的人群而言，總是有着屬於他們自身獨特的景觀建構過程。

當清初王朝國家對東川府及其所在的滇東北地區進行軍事征服，並強制性改土歸流之際，各類新興城池建築實體自然無可避免地會突破當地原有景觀格局，此外亦透過各種口承、文本和圖像話語建構出滿足從帝國視角觀看和想象的地方景觀。不過，除單一帝國視角外，本文還將景觀置於隨着不同人群參與而呈現出動態的再現過程中。生活在這一地域的各類西南土著與不同的外來群體之間，對景觀的敘述以及操弄與景觀本身之間彼此往復影響。景觀因此位於不同人群所經歷的或者想象的日常生活過程中。因此，本文以改土歸流前后滇東北地區東川府的文昌宮移建為個案，討論西南城市中的文昌宮如何被各類不同人群加以改造，並動態地呈現於不同話語中。從而追問在邊陲之地與中央王朝整合的歷史過程中，處在帝國邊緣、族群雜處地域內的城市景觀，如何被地方官員和文人菁英解讀和建構的過程。並進而呈現官方菁英版本外，生活在城市景觀中的不同群體形成的各自日常經驗以及歷史記憶的複雜情形。

二、清初滇東北的改土歸流與城池興修

清代東川府所在的滇東北地區，長期由強大的土酋勢力盤踞，缺乏中央王朝實質有效的軍事行政管控。元朝征服雲南之際，隨建朝之初軍事征服，在此設有行政建制，但隨後並未能在此地長期深入地有效經營。明初洪武年間在此設立東川軍民府、烏撒軍民府、芒部軍民府和烏蒙軍民府，屬四川承宣布政使司管轄。^⑨ 由於地處四川布政司最南端，這一區域實則長期脫離明

^⑧ Barbara Bender ed., *Landscape: Politics and Perspectives*.

^⑨ 張廷玉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卷311，〈列傳〉，〈四川土司一〉，頁8002-8004。

王朝的有效管控。儘管明王朝之後通過設立衛所制度將王朝勢力深入西南，但始終未能安置於滇東北烏蒙、東川、芒部。^⑩

明中葉後，烏蒙與東川兩地被土司祿氏家族控制。土司勢力之外，分散在各地的營長、頭目勢力又各自佔據一方。此外滇東北以及黔西北一帶各級土酋集團之間往往相互聯姻，形成錯綜複雜的勢力格局，他們多次反叛中央王朝統治或進入其他地區掠奪財物，同時其內部也往往因爭奪世襲權以及其他利益而內亂不止。清初順治十六年（1659）東川府土司祿千鐘歸附清廷，之後傳位於其子祿永明。康熙七年（1668）祿千鐘去世後，其七子及各自妻氏所代表的不同氏族勢力之間爭奪權力，土司職銜幾度易位，東川府內再次陷入長期內部爭權的動亂中。至康熙三十六年（1697），七子之一祿永明之遺孀祿氏因其兩幼子皆被殺，不得已帶印投誠清政府，以「獻土歸流」保其既有地位和財產。清政府帶兵進入東川，設立流官知府、經歷，屬四川永寧道管轄，實現名義上的改土歸流。^⑪不過，此時東川府流官並未真正有效管控地方。直至雍正初年雲貴總督鄂爾泰以大規模武力在滇東北強制改土歸流，此地才初步納入清帝國的實質管轄：

（雍正）四年春以鄂爾泰巡撫雲南，兼總督事，奏言：「雲貴大患，無如苗蠻，欲安民，必先制夷；欲制夷，必改土歸流。而苗疆多與鄰省犬牙錯，又必歸併事權，始可一勞永逸。即如東川、烏蒙、鎮雄，皆四川土府，東川與滇一嶺之隔，至滇省城四百餘里，而距四川成都千有八百里。去冬，烏蒙土府攻掠東川，滇兵擊退，而川省令箭方至。烏蒙至滇省城亦僅六百餘里。……東川雖已改流三十載，仍為土目盤踞，文武長寓省城，膏腴四百里無人敢墾。若東川、烏蒙、鎮雄改隸雲南，俾臣得相機改流，可設三府一鎮，永靖邊氛。」^⑫

⑩ 秦樹才，〈明代軍屯與雲南社會經濟的發展〉，《昆明師專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9年第3期，頁113-119。烏撒部除外，明代在此時已逐漸將勢力深入水西烏撒地區。參見溫春來，〈從「異域」到「舊疆」：宋至清貴州西北部地區的制度、開發與認同〉，頁73-106。

⑪ 《清聖祖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影印《清實錄》本），卷191，康熙三十七年十一月，頁14。

⑫ 魏源，〈聖武記〉（道光二十二年〔1842〕刻本），卷7，〈土司苗蠻回民·雍正西南夷改流記上〉，頁2-3。

鄂爾泰指明東川府自改土以來「仍為土目盤踞」，改土歸流徒有其名。康熙年間的獻土歸流雖然使得清政府進入東川府，但僅局限於原由祿氏土司所控之地，而各大土酋勢力尚在其控制之外，隨時威脅着東川府的流官政權。^⑬東川距四川省會成都距離遙遠，無法得到有力控制。因此，鄂爾泰特別奏請將滇東北東川、烏蒙、鎮雄改併入雲南省，並即刻強行執行改土歸流。

此奏請立即得到雍正帝准許。隨後，鄂爾泰於雍正四年（1726）九月率兵進駐東川，進而攻佔烏蒙、鎮雄兩土府，迫使原烏蒙、鎮雄土司敗退至金沙江北岸。雍正五年（1727）滇東北地區的流官政府暫時建立。隨後清政府進軍裁撤東川府內的營長、頭目，並將其所控地域改為四鄉八里，編立保甲。^⑭由此清政府在滇東北地區初步建立軍事行政控制。

不過滇東北局勢並未完全穩定，雍正八年（1730）此地再次出現暴動。原烏蒙土司祿鼎坤子祿萬福，在位於東川與烏蒙之間的魯甸起兵，隨即攻陷烏蒙。整個滇東北包括東川、鎮雄以及黔西北的威寧一帶的反叛勢力全部起而應之。雍正八年這次叛亂，起於烏蒙祿氏，並且引四川涼山土酋勢力進入滇東北地區攻擊清軍，使得清軍傷亡慘重。^⑮雍正八年八月，鄂爾泰撥兵六千進行鎮壓，於大關、米貼（永善）、魯甸一帶「數百凶寨，盡為屠洗」，以徹底鏟除當地叛亂勢力。^⑯在清軍屠洗式手段的壓制下，這場暴動於雍正八年十二月平叛。^⑰僥倖殘存的反叛勢力，再次退往金沙江北岸涼山地區。至此，滇東北局勢基本被清政府掌握，滇東北一帶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再未發

⑬ 鄂爾泰在此所指的土目，即東川府內部的「六營長，九頭目」：「東川所謂六營長者，待補營、則補營、者海營、巧家營、阿汪營、以扯營；九頭目者，火紅、那姑、馬書、法憂、弩革等九處也。營長主兵，頭目主賦，土府以為心腹爪牙。其侵擾四境，劫掠平民，皆此輩為之。土府陰為護持，及尾大不掉，土府亦無如何。雍正五年，總督鄂疏乞改作四鄉八里，編立保甲，分屬巧家經歷、者海典史，待補、則補兩巡檢司，其患乃靖。」乾隆《東川府志》，卷14，〈秩官〉，頁20-21。

⑭ 〈雲南總督鄂爾泰奏報剿撫烏蒙土司情形摺〉，雍正五年正月二十五日，載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雍正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第8冊，頁923-926。

⑮ 乾隆《恩安縣志稿》（《昭通舊志匯編》，第1冊，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6，雷世電、訾昌義據清宣統三年〔1911〕抄本點校），卷5，〈武備〉，頁65。

⑯ 乾隆《恩安縣志稿》，卷5，〈武備〉，頁66。

⑰ 〈雲南總督鄂爾泰奏報進剿烏蒙等處苗倮各路報捷情形摺〉，雍正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雲南總督鄂爾泰奏覆剿撫苗倮及添設兵將事宜摺〉，雍正八年十二月十七日，分別載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雍正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第19冊，頁518-530、665-667。

生大規模的土酋勢力叛亂。清政府重新在此設置行政區劃，烏蒙被改名為昭通，首府為恩安縣，府縣同城。昭通府下設恩安縣、永善縣、靖江縣以及魯甸廳、大關廳和鎮雄州。¹⁸ 東川府下設會澤縣與巧家廳，會澤縣為東川府治所。¹⁹

與改土歸流同步進行的是清政府在滇東北地區的城池重建。東川府位於烏蒙山主峰地段，境內地形複雜，起伏較大，立體氣候明顯。地方民諺稱「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境內超過九成以上是山地，僅有0.5成左右的盆地。²⁰ 在山地眾多的西南地區，盆地地貌俗稱為壩子。壩子地勢平坦、水源充足、耕地集中，是主要的產糧區。東川府城所在壩子是東川府內最大的盆地之一，現今稱為會澤壩子，位於府境中部偏西，為東北向斜長型，面積約53平方公里。²¹ 如前所述，東川府於康熙三十六年（1697）「獻土歸流」前為祿氏土司控制，其土司府即位於現今的會澤壩子。獻土歸流後，清政府於康熙三十九年（1700）也在此地建立起自己的土城，草創流官政府衙署以及兵丁房舍。²²

類似的，雍正五年（1727）改土歸流後，清政府也先後於烏蒙、鎮雄一帶原土府所在的壩子重建土城。不過新建於壩子中的流官土城，實則在改土歸流前期依然孤懸在此，受到滇東北境內其他地區中反叛勢力的包圍和威脅。雍正八年（1730）暴亂中，烏蒙土城一度被反叛土酋勢力所攻破，而東川土城也一直處於被圍攻的危急局面。儘管清軍最後平定此次暴動，但也遭受慘重損失。因此，自雍正九年（1731），滇東北重要首府東川、昭通（烏蒙）、鎮雄，以及內部的重要交通要道上的大關、魯甸、巧家、鹽津，清政府都特意精心挑選建城地點並建起全新的城池，以期防禦並控制地方反叛土酋勢力，鞏固清政府在此初建的流官政府。

不過，清雍正朝在這一時期對滇東北地區採取強行武力改土歸流以及鞏固地方建設，並非僅針對本地叛服不常的土酋勢力，還為全權控制東川府內豐富的銅礦資源。明清易代經濟復蘇後，國內市場銅錢需求量也隨之增長，而同一時期日本銅礦產量降低以及限制出口的政策，導致當時清帝國鑄幣銅

¹⁸ 乾隆《恩安縣志稿》，卷6，〈藝文〉，頁76-77。

¹⁹ 乾隆《東川府志》，卷3，〈建置〉，頁4。

²⁰ 雲南省會澤縣志編纂委員會編纂，《會澤縣志》（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3），頁1。

²¹ 雲南省會澤縣志編纂委員會編纂，《會澤縣志》，頁65。

²² 乾隆《東川府志》，卷3，〈建置〉，頁4。

材的缺乏。為了控制貨幣制度的穩定，清帝國加大對於國內銅礦的開發力度，雲南省內尤其是東川府內豐富的銅礦開發成為關鍵。因此，在滇東北地區建立穩定的軍事政治基礎後，清政府隨即開始對東川銅礦資源的開發。乾隆三年（1738）下令京局全採滇銅，滇銅成為中央政府鑄幣銅材的唯一來源，乾隆朝滇銅開採極其盛時，雲南銅廠的分佈區域可分為滇東北、滇中部和滇西部三大區域。東川府內的湯丹、碌碌和大水溝等銅礦的出產量一度佔雲南全省礦產的百分之七十，成為此時京銅最為仰賴的銅礦產地。^② 自東川府出發的滇銅京運也隨即開始，東川、昭通、鎮雄、大關、魯甸、巧家、鹽津皆為銅運路綫中所必經的重要節點。

作為銅礦的產地東川，一時間「民夷商賈，四方輻輳，食貨浩穰，屹然一都會」。^③ 東川府新興的城市景觀成為帝國在西南經營得當並促進地方發展進步的物質證據。其中，分佈在東川府城四周的文昌宮、文筆塔等文運建築，成為當時最為引人矚目的全新城市景觀之一。一般認為，文昌宮、文筆塔這類建築是作為一地城市景觀中所必備的建築要素，通常須謹慎地依據地方風水格局擇地而建，以此興盛地方文運並為地方士子以及文人菁英拜祭。不過下文將逐層展示在東川府這處18世紀新近納入帝國西南疆域的時空背景下，這類文運建築實則包含着清帝國別有深意的經略之舉。更為重要的是在官方話語之外，文昌宮亦為地方不同群體族群各自解讀，從而構成多重的城市景觀意象。

三、清初東川府文昌宮移建

自雍正八年（1730）清政府徹底改土歸流後，東川府內的各類新建築逐漸增多，其中就有位於東川城西三里左右的金鐘山上的文昌宮。乾隆《東川府志》載：

二月三日上金鐘山。會澤縣許肇坤建文昌祠、魁星閣於其頂。
郡人祀之，優伶晏飲不異青龍寺。今移建於華宜寨。^④

^② 嚴中平編著，《清代雲南銅政考》，頁1-13。

^③ 劉藻，〈東川府志序〉，載乾隆《東川府志》，卷首，〈序〉，頁1-2。

^④ 乾隆《東川府志》，卷9，〈風俗〉，頁1。

文昌宮，在城南金鐘山，祀梓潼帝君，每歲二月三日祭。今捐俸移建華宜寨，艮山坤向，風脈甚佳。²⁶

文中提及的會澤縣令許肇坤任職於乾隆十年（1745）至十二年（1747），²⁷故可推知此處文昌祠及魁星閣約建於乾隆十年至十二年間。之後，此地因文昌宮的建成形成規模不小的廟會。不過，儘管這裡每年農曆二月三日的文昌誕廟會都十分熱鬧，引文卻記錄金鐘山上的文昌宮在隨後被移建於另一處風水更好的華宜寨。

此事在乾隆二十五年（1760）上任的東川府知府方桂所作的〈移建文昌宮魁閣於華宜寨序〉中有詳細描述：

東城依麓有山，突然包裹作回顧勢，曰金鐘。前令聽形家言，築文昌宮、魁閣於其上，殆若紐然，所以發聲文教也。意非不善，迨十餘年來委頓猶昔，文戰輒不利，多謗咎於此焉。豈地靈人傑必有待而然歟？予素重溫公，不信形家，而都人士思謀移建，取其奮志萌動之機也，因託為形家說以導之，而允其請。乃進諸紳士而告之曰：「堪輿多妄論，惟《乾鑿度》為可，次取《玉尺經》。二書皆言下沙不可取，文筆峰此地誠非所宜，吾為爾等擇來龍顧母處，所謂對面看高處，看隱隱隆隆者是。」檢吉辰，遷奧區，去城北十里華宜寨，是卜是築，規制加輪奐焉，諸生今而後其無所待矣。……吾謂爾諸生無信形家言，但立勤身志，棄厥舊，圖厥新。斷絕金鐘紐，遷建華宜寨，可操券而預決云，是為序。²⁸

新任知府方桂回顧了早前文昌宮的建築歷史。據他描述，過去會澤縣令許肇坤聽從風水師的建議，選擇在金鐘山這處山峰上建造文昌宮，期許文昌宮如同一個紐結，能夠鎖住運勢以使東川府文運興盛。不過，隨後十年內，當地生員卻一再科考失利，他們認定文昌宮並沒有被建在興盛文運之處，於是懇請方桂另擇寶地移建文昌宮。方桂覺得這不失為鼓勵生員求學的良機。因此，他以自己認可的風水知識，重新選定能夠興發文運的風水寶地修建文昌

²⁶ 乾隆《東川府志》，卷7，〈祠祀〉，頁2。

²⁷ 乾隆《東川府志》，卷14，〈秩官〉，頁3。

²⁸ 乾隆《東川府志》，卷20下，〈藝文〉，頁44-45。

宮。方桂提及的「下沙（砂）」以及「來龍顧母」都是特定的風水術語。砂，在風水格局中意指環繞於建築或者城池前後左右的群山。²⁹ 方桂判斷文昌宮並不適合建於城池西南的金鐘山，而應當建於由他判定的「來龍顧母」處（意即主山脈的一端呈現為倒鈎形，似龍子扭頭望母）。總之，方桂認定位於城池東北十里左右的華宜寨，正是適合移建文昌宮之處。

此外，方桂還另於東川城北十里、華宜寨西側再建一文塔與文昌宮互相呼應。為此他又作〈創建寶塔記〉，詳盡描述他的期許和建築過程：

東雖荒微，而所為清淑秀華之氣，造物未嘗靳也。……余調補斯任，慮人物狃陋，日以作育為兢兢，乃整飭書院，嚴考課，時進士子而教之，竊欲共勉於有成。越數月，有議文昌宮之改建為余告者，彼青鳥家言誠無足信，然文魁二星所以默相斯文者，厥功匪淺，則其宮殿臺閣允宜占形勝焉。因俯從眾請，且亦轉移丕變之一機乎。而府治之北約十餘里為魚洞，以里、蔓海諸流匯出之所，兩山夾鎖最密，但其山勢平衍樸拙，少靈峭之致，且一望童巔荒涼寡色。余曰：「嘻，東之缺陷尚在斯耶。」因與會澤令王君相其陰陽，度其形勢，各捐清俸，添建寶塔一座，以為兩山峰巒，且與華宜魁閣遙遙對峙，覽之宛如文筆摩天，亦石城巨觀也。……夫梵本所傳，吾不暇深求，東人士有繼此掇科第者，亦效韋肇之所為，當亦千秋佳話也。然則斯塔之建，乃所以鼓舞而作新之，豈徒壯觀云爾乎？其慎勿更諉於山川之不靈，而負余之厚望則幸矣。是役也，經始於辛巳（1761）六月，落成於本年十月，高四丈有奇，廣四丈，制凡七層，效七寶義也。³⁰

方桂在華宜寨修建文昌宮後，又覺得東川城池北側十餘里這處名為魚洞的村中，山勢過於平緩荒涼，是東川府內山川美景以及風水上的另一處缺憾。因此，他與時任會澤縣令王壯圖一同捐出俸祿，在此建立一處高四丈多的文筆塔，與對面華宜寨的文昌宮、魁星閣遙相呼應，成為另一處助長東川文運的重要景觀。方桂顯然十分滿意由他修建的這兩處建築。因此，在他掛名主筆的地方志書的東川府輿圖中，兩處建築都被着重描畫。在輿圖上華宜寨處特

²⁹ 亢亮、亢羽編著，《風水與建築》（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99），頁79-81。

³⁰ 乾隆《東川府志》，卷20下，〈藝文〉，頁17-19。

意寫明「文昌閣」字樣，在金鐘山上的文昌宮則在移建後不再標明。在魚洞村的山峰上，文筆塔則被刻意描畫並在高度記錄上標記為更高的「五丈」，可見在地方菁英眼中兩處建築的重要性。（附圖2）

方桂精心在城外東北以及城北一帶籌劃了文昌宮與文塔的興建，並相信今後東川府的生員會受鼓舞而一心向學、屢屢中榜，東川定然會文運興盛。^③ 然而，與其他新近納入帝國的邊疆之地類似，東川府實則並無太多讀書之人，直至清末咸豐年間才略有增多。^④ 對於東川府內不多的生員而言，其求學的實際情況可能也並非如他所言。當時東川府內的生員似乎對投身仕途並不重視，尤其在乾隆銅礦開採盛期，「當時東川各廠正旺，諸生多有廢學趨利者」。^⑤ 或許這才是生員科舉屢屢不中的原因，而重建文昌宮之舉，可能是僅是地方官員方桂的主觀意願，似乎並未被乾隆年間的地方文人重視。移建文昌宮的過程看似受到風水觀念的影響，但實則卻並不直接來自風水師的風水知識，而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地方官員所認定的風水知識。同時，雖然在地方官員的話語中強調由特定的風水觀念導致景觀的生成，但風

③ 尤須注意的是，此時調入東川任知府的方桂，並非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地方官吏。他祖籍湖南巴陵，父親方顯是清初開辟西南新疆的朝廷重臣，雍正年間升任貴州鎮遠知府。這一時期，雲貴總督鄂爾泰以武力對西南一帶的苗疆進行改土歸流。時為貴州鎮遠知府的方顯，成為鄂爾泰重用的官員之一，並於雍正四年至七年間（1726-1729），在貴州境內各處土酋勢力集中的地區屢屢立下戰功。乾隆三年（1738），方顯調升為四川布政使，隨後一年即升任四川巡撫，主要處理本地遺留的土酋勢力。他在乾隆五年（1740）調任廣西巡撫，一年後告病返鄉。方桂早年跟隨其父征伐貴州苗亂。其父病逝後，先於廣東英德、朝陽任知縣，之後被調回西南，升為雲南昆陽知州。乾隆二十年（1755），他任雲南臨安知府，於乾隆二十二年（1757）調任東川。乾隆二十六年（1761）因丁母憂而卸任。趙爾巽等，《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77），卷308，〈列傳〉，〈方顯〉，頁10579-10583。

④ 「其餘各屬內有安平、文山、寶寧、巧家、會澤、恩安、大關、魯甸、思茅、威遠、他郎、寧洱、中甸、維西、龍陵、緬寧等十六廳、縣，從前或因戶口稀少，或因缺係新增未設學額。至咸豐年間，生齒日繁，讀書之人漸多，每以無處應考，紛紛稟呈。」岑毓英，〈滇省捐輸請廣額設學摺〉，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十八日，載方國瑜主編，《雲南史料叢刊》（昆明：雲南大學出版社，2001），第9卷，頁407。

⑤ 一則對時主東川西林書院講席的嚴煥的描述透露出此類情形。光緒《東川府續志》載：「嚴煥，字匡山，宜良人，乾隆癸丑進士。先一年壬子，主講東川西林書院，訓迪有方，至是選庶吉士，歸當道，復聘西林書院講席。當時東川各廠正旺，諸生多有廢學趨利者，煥篆『正誼』二字懸於講堂，題其旁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董江都語也。漢儒稱仲舒第一，臣以此東郡產五金，人爭趨之，學者亦然，余甚惜焉。』」光緒《東川府續志》，卷3，〈寓賢〉，頁15-16。

水並非城中景觀形成的唯一標準。因此，在興盛文運以外，還需進一步討論方桂重修文昌宮之舉背後所隱藏的深層意義。

四、「華宜寨」或「挖泥寨」？

前述方桂多次提及將文昌宮移建位於城外東北處的華宜寨。然而，華宜寨並不是此地唯一名稱。雍正《東川府志》將此地記為「瓦泥寨」，^⑳ 雲南總督鄂爾泰在其奏摺中記為「挖泥寨」，^㉑ 現今行政區劃記為「華泥寨」。^㉒ 乾隆《東川府志》關於本地村寨的諸多記錄中，唯獨在「挖泥寨」一地詞條下特意注明「今改華宜」。^㉓ 因此，取意為華人適宜之所在的「華宜寨」這個名稱，開始於前述乾隆《東川府志》中，特別是在方桂所撰文中。華宜寨這個名稱很可能是方桂本人的創造。實際上，這類發音近似但漢文不同的各種表達，都是源於彝語發音的村寨名稱，即為「山邊的村寨」之意。原來，前述方桂筆下的「華宜寨」，正是位於壩子東北處的挖泥寨，是改土歸流前的土著聚集地之一。

類似的情形同樣出現在方桂特別修建文筆塔的魚洞村中。在方志纂修者的筆下，魚洞村的疙蚤山得名於山上所產的大量的蚤蟲，「產蟲類土蚤，秋初嚙草殆盡」。^㉔ 但此處山名實際上也源於彝語近似音。根據現今當地彝族楊金全的解釋，其意應當為「土司駐紮兵馬的山崗」，並非以漢字望文生義的「產蟲類土蚤的山崗」。^㉕ 此外，疙蚤山另一側青龍山下的水城村，正是過去東川土司祿氏水城所在。乾隆《東川府志》載：

祿氏水城，在羅烏門外青龍山下，今毀。趙淳舊志：「四周皆水，石基僅存，尚有黑爨數戶。」^㉖

^⑳ 雍正《東川府志》（雲南省圖書館藏1957年據清乾隆五年〔1740〕刻本摹抄本），〈村寨〉，頁15。

^㉑ 〈雲南總督鄂爾泰奏報官兵報捷恢復烏蒙詳情摺〉，雍正八年十月十七日，載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雍正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第19冊，頁299-301。

^㉒ 雲南省會澤縣志編纂委員會編纂，《會澤縣志》，頁38-48。

^㉓ 乾隆《東川府志》，卷8，〈戶口〉，頁2。

^㉔ 乾隆《東川府志》，卷4，〈疆域〉，頁6。

^㉕ 楊金全，〈彝語地名譯釋〉，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雲南省會澤縣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會澤文史資料》，第10輯（2000），頁205。

^㉖ 乾隆《東川府志》，卷5，〈城池〉，頁2。

文中所提到的「羅烏門」即東川城北門，得名於鄂爾泰，意指「網羅烏蒙」這處位於東川府北部、長期由烏蒙祿氏土司統治的地域。^① 在東川府地方官員的眼中，東川城池以北的空間以及更為廣泛的地理區域，是土著的勢力範圍。因此，疙蚤山、青龍山以及青龍山以東的挖泥寨等城北的景觀，實質上蘊含了土著特別是祿氏土司的歷史。^②

雍正八年（1730）的叛亂中，反叛土酋勢力很快就佔據了東川府城所在壩子四周的村寨。東川府城四周的村寨特別是城西的土城以及城北的挖泥寨曾是勢力反叛勢力的重要據點。作為主要的戰場之一，清軍和土著反叛勢力在挖泥寨多次發生血腥對抗。鄂爾泰曾在其奏摺中特別說明：

東川一路，烏猓萬數，半已渡江。……東川境內，如挖泥、矣氏、歹補、阿汪等寨，東川境外，如急羅箐、施魯、古牛、畢古等寨，迤邐至於武定、尋甸。凡進東川隘口，拆毀橋梁，沿途堵塞，以致往來斷絕，聲息不通。……自九月二十二日至十月十五日，節據張耀祖咨並鎮將等驗報：烏賊勾合東川諸彝，在府城四境、大箐口、土城、馬鞍山、馬五寨、挖泥寨等處焚掠村寨，截斷糧運，殺傷塘兵。魏翥國於九月十一至十四等日遣將出剿，官兵奮勇，日斬數十級、百餘級，日殺三四百賊不等，帶傷者無算。……迨十月初四，官祿遣遊擊紀龍等帶領官兵直抵挖泥寨一帶賊營，猓賊數千，攻擊數次，賊眾大敗。鎗砲打死三百餘人，斬獲首級三十餘顆，帶傷滾箐，脫逃無數。^③

引文中所言「烏猓」以及前文提及的「黑爨」這一群在東川府內官方眼中兇蠻的土著群體即對應當今民族識別中的彝族。彝族在當今民族識別前被稱為“lulu”或者（luoluo、lolo、倮、猓、羅）。在滇東北地區的方志記載當中，烏猓（黑猓羅）或者爨是凶蠻的強勢群體，他們往往佔據山區中的平壩

① 鄂爾泰，〈題東川城門說〉，載雍正《東川府志》，〈藝文〉，頁37。

② 與此同時，在與祿氏土司家族歷史密切相關的青龍山上的景觀和信仰空間，也經過了地方官員的重新建構。參見黃菲，〈祀真武或祭龍潭——清初雲南東川府的信仰空間交疊與景觀再造〉，《新史學》（臺北），第23卷，第4期（2012年12月），頁119-161。

③ 〈雲南總督鄂爾泰奏報官兵報捷恢復烏蒙詳情摺〉，雍正八年十月十七日，載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雍正朝漢文硃批奏摺匯編》，第19冊，頁299-301。

資源，並且用其他群體為其服役。^④ 他們在改土歸流中喪失利益，並前後數次發動叛亂以奪回原有的在滇東北地區的統治地位，也因而成為清官方眼中最為「冥頑不化」的群體。

因此，乾隆二十五年（1760）調入東川任知府的方桂移建文昌宮之舉並非僅為因應地方文人之請，而是另有深意之舉。在方桂和其他地方官員的主導下，原本是本土叛亂族群聚集地的「挖泥寨」，被重新命名為適宜漢人居住的「華宜寨」，並移建文昌宮於此。此外，從前屬於祿氏土司的勢力範圍的城北魚洞村中，也建立了與此文昌宮對應的文峰塔。在方桂的眼中，重建文昌宮是對地方生員的鼓勵，但同時又是對邊蠻之地的改造，以期建成理想中的文運興盛的帝國景觀。而原來屬於本土叛亂族群的景觀，轉變為屬於清王朝的興盛文運的全新景觀。不過，在這層官方的文明化操弄之外，值得深入考慮的則是在具體的地方情境當中各方群體對此的各自解讀與認知。

五、興文運或抑水患？

如前所述，改土歸流後類似東川府這類新近納入帝國疆土的地域，地方禮儀建築亦成為官員有效經營地方的物質證據。^⑤ 不過，也因為改土歸流後地方社會的變遷，東川府城所在壩子中的各方群體對於地方景觀衍生出各自不同的詮釋，而並非僅局限於官方論述。

實質上，花費諸多周折興建文昌宮以及文塔後，東川府文昌宮的狀況並非如方桂所料的那樣。城東文昌宮在隨後光緒年間的府志以及各類由地方文人所作的藝文中完全未被提及。緊靠城池西牆外金鐘山上這處被方桂以及他口中的地方生員認定不合乎風水、不能助長文運的文昌宮，卻並未因新建了城東文昌宮而被廢棄。金鐘山上的文昌宮先後重修於乾隆五十六年（1791）

^④ 諸如，苗人「性懦而狡，善治田，為爨焚服役」；乾人「最勤苦，近皆畏威懷德，一洗從前舊習，業儒者千之一，餘皆刀耕火種，農隙則樵牧漁獵」；披夷則「性情慙默，形狀兇惡，語言與熟夷不同，好搶擄，不知法度，其大戶別無蓄積，惟牛、羊、奴僕百十，隨時遷徙，藝山糧者十之七，藝水田者十之三，水田多熟地，藝畢上山，成熟下取。其交接款待有禮，間有入其家者，恭敬晏樂過於漢人，約必順從，並無他意」；而「披沙夷」則「盡黑裸羅，為爨人遺種，身長踰格，面黑力大，跣足善走上山」。乾隆《東川府志》，卷8，〈戶口〉，頁12-20。

^⑤ 在文廟、文昌宮、文塔、書院等與地方文教直接或間接相關的禮儀建築的興修中，類似的敘述都作為重要的修建背景被地方官員強調。其中，文廟更是成為東川府西門外最為顯著的建築。限於篇幅，本文無法深入討論。

以及咸豐、民國年間，並與金鐘山一同成為東川府城重要的地標之一，成為不少當地文人交遊作詩之處，^{④⑥} 並作為重要的文物保護單位以及當地居民首要的生活空間保留至今。^{④⑦}

但文昌宮對於當地居民的重要意義並非僅局限於此。一則關於城西金鐘山的傳說故事，至今家喻戶曉：「會澤人祖祖輩輩流傳一個神話。從前有九條蛟興風作浪，鬧得會澤壩子滂災頻頻。農民叫苦連天，於是金鐘山的文昌爺爺大施惻隱，化作一個賣稀豆粉的老倌去收復九蛟。九條蛟搗蛋成性，還要去訓文昌爺爺的科場。他們變作九個哥們去吃稀豆粉，文昌爺爺看準時機，把稀豆粉鍋向九條蛟反罩下去。原來只罩住八條，邊上的一條沒有完全罩住，被壓斷了一條腿跑了。被罩的八條蛟和一條腿，被文昌爺爺鎮壓在金鐘山神座下。從此之後蛟龍除盡，水患根除。」^{④⑧}

原來，當地民間口傳中，文昌帝君是十分重要的治洪神祇。文昌帝君一向被認為是主宰人世功名利祿的神祇。在其祭祀人群中，為官者祈禱官途順利、平步青雲，求仕者則祈禱科舉高中。不過，中國民間信仰中神祇由單一功能發展為多功能是普遍存在的現象。文昌帝君在民間也可兼職甚多，成為在廣義上消災解難的地方神。東川府內的水患治理密切結合在一起。

這類對地方頻發水患的歷史記憶，很大程度上又與東川府城池所在的地理環境有着緊密關聯。前述祿氏土府以及之後清政府所在地的壩子，是東川府內僅有的幾處盆地之一。不過，在此壩子的中部是一片被稱為「蔓海」的沼澤區，每年夏季都會爆發洪災。乾隆《東川府志》載（另見附圖3）：

④⑥ 如，李慶鏞，〈金鐘山〉；馮慶榜，〈東川雜詩〉；謝鴻詔，〈金鐘夕照〉；史光華，〈東川雜詩〉；謝家樹，〈東川雜詩〉，載光緒《東川府續志》，卷4，〈藝文〉。又如，〈東川十景詩並引〉：「十景或出傳會，然不概虛也。舊志載：『方公十律，嗣音闐然。』辛巳（1881）九日，李實甫學傳，茅紫芳、劉鳴坡、孟品三、湯潤金、劉翼卿、周寅齊諸孝廉，孟宜春、徐雲從茂才同登金鐘山。」田永光主編，《會澤歷代詩詞選》（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10），頁51。

④⑦ 陶正明、梅世彬主編，《會澤縣文物志》（昆明：雲南美術出版社，2001），頁59-60。

④⑧ 這個流傳很廣的故事在基本結構上，因細節不同有着多個版本。其中，另一則被記錄的版本，則在故事之外透露了另一個情節，「再說文昌爺爺用來伏龍的那口大鐵鍋，隨着時間的增長，逐漸變成了一座鬱鬱蔥蔥的青山。人們覺得，把這樣的山稱為『鐵鍋山』不太美，便以其形狀與金鐘相似為由，把『鐵鍋山』改稱為『金鐘山』」。會澤縣人民政府編，《雲南省會澤縣地名志》（會澤：會澤縣人民政府，1987），頁277-278。這個細節似乎也暗示「金鐘山」這個山名，可能並非是此處山峰最初的名稱。

蔓海，一名濯纓湖，在府城北門外，由西至東長二十餘里，自北而南闊十里許。崔志載：周三十里，一望蘆葦浸波瀾。中產魚蝦芹苳菱角，土人亦資以為利。積年朽葦沉沒水中，盤結如地，人行其上，動搖不定，以竹竿探之，深入一丈五尺餘，仍未至底，引出竿頭不帶土泥。五六月積雨，則漲而為湖，泛濫洋溢，四畔田土俱苦水害。^{④⑨}

這類雲南山區中的濕地草甸地形，往往被當地人稱呼為「海子」。這類水域中的水產也成為土著獲利之用。東川府內的平壩資源並不多，而在東川府城所在的壩子中部的蔓海沼澤區又無法耕種，因此所能開墾的農田大多分佈在蔓海四周。自雍正六年（1728）開始，地方官員開始開通水渠將此地的積水引出，以此治理水患並試圖培植土地以用於耕種。一方面，清政府進一步積極招募各地漢民前來東川府城開墾整治之後的蔓海。^{⑤⑩}另一方面，雍正八年（1730）清政府武力剿除在地反叛勢力之後，清政府轉而以各種手段安撫反叛勢力之外所謂馴良的、懂得農耕的土著。原先依附於祿氏土司的從事農業或漁業生計形態的族群，轉而成為清政府所急需的勞力。^{⑤⑪}

金鐘山正位於東川府城所在壩子的西南邊緣處，金鐘山之上的文昌宮對於壩子內蔓海四周的村寨居民而言，更為重要的功用並不是護祐生員高中，而是作為保祐地方風調雨順、遠離水患的信仰空間。而當地對這里易發洪災的歷史記憶一直保存至今。對於同一處建築景觀，民間與官方可能呈現完全不同的解讀。城西文昌宮並未因方桂的全新規劃而被廢棄，在民間口傳話語

④⑨ 乾隆《東川府志》，卷4，〈疆域〉，頁21-22。

⑤⑩ 「雍正五、六兩年，知府黃士傑詳報開墾蔓海、者海田三千二十六畝，並墾民王應龍等四百一十三戶。至雍正九年，知府崔乃鏞清查並未開墾後各處可墾田地，共一十七頃一十三畝八分零。雍正七年知府羅得彥、知縣王忠武請領工本銀二千四百兩，墾民胡士傑等三十六戶開墾蔓海以濯河田五百二十七畝零，老哈等五十五戶開墾米糧壩田。」雍正《東川府志》，〈田賦〉，頁19。

⑤⑪ 在乾隆《東川府志》中，關於東川府內族群的分類有黑猓羅、白猓羅、乾猓羅、仲家苗、魯機、孟人、披沙夷、披夷等。在對黑猓羅、披沙夷、披夷等凶蠻反叛的群體武力鎮壓之外，清政府對於所謂馴良的、懂得農耕的土著，則採取了招撫的態度。乾隆《東川府志》，卷8，〈戶口〉，頁12-20。例如，「其東川各寨，有苗子、乾猓羅二種，舊屬馴良，不應驚擾。惟黑猓凶頑，故乘機起事，然較之烏逆，亦應分首從」。〈雲南總督鄂爾泰奏覆剿撫苗倮及添設兵將事宜摺〉，雍正八年十二月十七日，載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雍正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第19冊，頁666。

中亦呈現出別樣面貌。而若深入考察被方桂着力規劃構建的城東文昌宮及其東川府城所在壩子的東北區域，也隱含着官方敘述之外的本土景觀認知。

六、競爭的空間：漢甲與夷甲

其實自康熙三十六年（1697）獻土歸流前後，已經開始陸續有漢人進入東川。不過，直至雍正十三年（1735），位於東川府城內的居民僅僅只有二十戶的漢民，以及上百戶客民在此，且「悉無家室，來去無定」。^⑫ 這些漢人客民主要來自江西、湖廣、四川、陝西以及雲南曲靖其他地區，其人口隨着乾隆銅礦業興盛而倍增。^⑬ 這些新進入駐的移民因其社會經濟地位以及所從事的行業而各有不同角色，他們或進入到東川府以西的湯丹礦區中從事礦業，或加入到與滇銅京運相關的運輸業、商業、典當業以及各類生活、娛樂業中。其中，有一部份漢人移民定居於東川府城所在壩子的蔓海四周的各村落中，從事農業開墾以及各類手工業。挖泥寨（華宜寨）亦是位於蔓海東北邊緣的一個重要的村寨，因為此地根深蒂固的土著傳統使得改土歸流後不少招撫的土著繼續居住在當地，此外又不斷有外地漢人陸續遷入此地。因此，對於在挖泥寨中的文昌宮，在此生活的不同群體又有進一步的不同解讀。前述文昌宮鎮水患故事也體現在挖泥寨中，不過在挖泥寨文昌宮的故事則有更為複雜的層面：

很久以前，京城有位皇帝，荒淫無道，不理朝政，整天沉溺於酒色。朝野上下，怨聲載道。一天，東川府挖泥寨來了一位披髮老道，住在寨後一個石洞裡……製造了三口寶劍……遠飛京城刺殺昏庸的皇帝。一日，寨子裡的一個彝族老婦咒鷄，收藏寶劍的石洞被咒罵聲驚動……寶劍雖然飛到皇帝老倌的金鑾寶殿……結果，皇帝也未刺死，三口寶劍仍然飛回挖泥寨石洞中，老道人見狀驚慌失措，猝然失蹤。事後，挖泥寨連年水災，當地彝族百姓想了一個辦法，就在收藏寶劍的石洞之上修建了一座文昌宮，以護寶劍，鎮住水患。若干年後，府城人民又在金鐘山上修建了一座文昌宮，還把挖泥寨文昌宮的菩薩也搬到金鐘山文昌宮。金鐘山的叫西文宮，挖

^⑫ 雍正《東川府志》，〈戶口〉，頁14。

^⑬ 乾隆《東川府志》，卷8，〈戶口〉，頁12-15。

泥寨的叫東文宮。從此，以府城十字街劃界，東邊的百姓到東文宮做會，西邊的黎民到西文宮上香，而且兩宮都建了萬年臺，每逢年節，踩臺唱戲。東文宮是彝民集資修建，西文宮是漢族捐款建蓋，所以分為彝甲功邦和漢甲功邦。因為彝漢兩族各捐功德修建東西文昌宮，所以各為功邦，同盡心力。⁵⁴

這則以挖泥寨現今彝族住戶視角講述的故事收錄於20世紀90年代，其內容大致可分為數個不同故事的疊加和混融。前段為挖泥寨披髮老道刺殺皇帝未果，並最終導致挖泥寨土著受到年年水患易發的懲罰故事，這似乎與前述土著參與地方叛亂並最終失敗的歷史記憶相關。⁵⁵ 中段文昌宮在此地修建歷史的故事中，也有類似前述城西文昌宮鎮水患的情節，此處方桂所強調因文昌宮移建於此，而使得東川府文運興盛的效用同樣完全被忽略。

不過，更為重要的是故事後段講述挖泥寨的東文昌宮由彝人先建，隨後漢人模仿而在城西建立西文昌宮，並且據此劃分出兩類不同族群分別進行禮儀活動的情節。其敘事結構反映出土著對於東川地區的空間以及景觀變化過程的另一種解釋：在土著的歷史記憶中，此地祭祀活動有漢人與土著之分。不僅如此，土著還早於漢人修建文昌宮。更為特別的是在段末出現的漢人與彝人「漢甲、彝甲各為功邦」的故事，實際上對應自清光緒年間在華宜寨的地方制度。由現今保存在華泥寨文昌宮的光緒十四年（1888）的碑記中可以一窺當時的地方情形：

事案：據敦仁鄉華宜漢甲首事周澍、唐玉珍、徐應春、孟士臣、張昆、鄧得富、熊應禪、張勉仁、胡朝梁、潘雲鵬、姚時昌等，公稟酌定章程懇恩給示石，用遵勿替。緣敦仁鄉先年原無分甲之說，每年稟保鄉約一名，辦理一鄉條糧夫役事件。後因咸豐年間地方變亂、人民流離、條糧□□、一鄉一役合納完□，實為繁重，先輩紳糧公同妥議，會稟官府，分為六甲接年，以一人受累之事，

⁵⁴ 吳永湘收集，〈民間故事數則·三口寶劍刺皇帝〉，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雲南省會澤縣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會澤文史資料》，第3輯（1992），頁133。

⁵⁵ 關於挖泥寨的土著受到懲罰的故事還可以見其他當地收集的故事，例如在另一則〈夜郎公主〉的故事中，也講述了挖泥寨因其土酋之子的錯誤，導致玉皇大帝懲罰挖泥寨令其鷄永遠不會打鳴，挖泥寨也就永遠不能天亮的情節。〈夜郎公主〉，載郭天熙編，《會澤軼聞趣事》（會澤：會澤縣建設局、會澤縣老年書畫詩詞協會，2002），頁33-35。

□六人分任。其任既分，其累自輕，惟華宜一甲，廢田甚多，先輩紳糧尤恐累重，復稟前縣主，分為漢夷二甲，□□□□公□銀兩數百金，存本生息，年中作為賠款。誰料辦理十餘年□，所入不敷所出，□□□□廢弛，所剩無□，至光緒初年，受累難堪，賠款已屬無着，以致一甲良民紛紛興訟者數，年首等於光緒十一年再四籌商，□請紳管徐致君等倡首，稟請恩星作主，由甲內籌捐賠項以□民困，蒙恩□□總諭等籌捐，現今所捐銀數僅有尾□無多，除還前管借款，復取舊業外，新買田一形作賠累之資，□等擬定章程、開列糧單，其中情形是否理合，稟請核奪批示，給諭樹石，以垂不朽，為此伏乞……

闔甲首事

徐致君 徐□采 鄧得富 潘雲鵬 周士珍 周士達 胡朝梁 徐應春 熊應禪 姚時昌 徐致清 張飽仁 唐玉珍 徐致淦 鄭世臣 徐澄采 孟士臣 張昆 張有發

光緒十四年五月二十七日華宜漢甲公立

碑文主要講述光緒年間華宜寨的里甲編配狀況。立碑者是在此生活的漢人氏族代表「漢甲首事」。據他們追述，華宜寨所屬的敦仁鄉的里甲制度原本每年由鄉約一人來辦理賦役，但因咸豐年間整個滇東北爆發回民動亂，地方社會經濟受到很大破壞。因此平叛動亂後華宜寨所在的東川府敦仁鄉，通過將一鄉一甲分為六甲輪年的方式以減輕賦稅負擔。不過，這種新的里甲輪年方式在華宜寨又有特別處理，如果輪到華宜寨當年，則在其中分為漢、夷二甲以分攤賦役。此碑文所討論的主要議題即早前所集資用於繳納賦稅的本金，在咸豐年間動亂十餘年後的光緒年間已經不足以負擔賦稅。因此，華宜寨中的漢甲首事決定再次籌款購置田地以作為今後的賦稅開支。

由於這塊碑文主要處理華宜寨的漢甲賦稅劃分，因此並未詳細提及漢、夷二甲劃分以及夷甲賦役具體操作的情形，但卻從側面反映出至清朝晚期，此地依然有為數眾多的夷戶以致需要分立夷甲用以承擔賦稅。此外，漢、夷二甲的分擔，正呼應前述以挖泥寨彝人修建文昌宮的故事。故事中彝人強調東、西文昌宮分別由漢、彝（夷）各自捐修，並強調漢、彝（夷）二甲各為功邦，這似乎正暗合漢、夷二甲在華宜（挖泥）寨中分攤賦役的情形。前述來自現今挖泥寨當地彝族的故事，無論是時間順序，還是行為主體者，都呈

現出與官方敘事截然不同的另一種歷史記憶。在其敘述當中挖泥寨的東文昌宮成為由本地彝民集資修建屬於彝族的廟宇，以鎮住水患保祐當地彝民。

在此，文昌宮成為了在華宜寨中生活的不同群體之間的爭奪的空間。自改土歸流後陸續遷往此地的諸多漢姓家族，則採用了類似官方的敘述方式，從而確立自己在當地居住的正統性。前書碑記中即可發現在此漢甲首事們沿用官方說法將此地稱為華宜。碑文中出現的徐氏家族，在光緒《東川府續志》中亦多有提及，諸如徐汝瑄開設學堂並捐修華宜寨文昌祠，以及徐攀桂勸導當地夷人放棄火葬習俗之事跡。⁵⁶ 在方志語境下的敘述，繼續沿用制式的話語，將在華宜寨居住的徐氏家族描繪為在此地倡導文教並開化夷俗的卓行代表。

此外，儘管在官方文本以及漢甲首事碑文中，「華宜」取代「挖泥」成為蘊含深意的新地名，當地不同的漢姓家族對此亦有不同解讀。出現在前文碑記中的漢甲之一的鄧姓家族即保留有與此相關的第一代始遷祖鄧伯生的傳說。現今在挖泥寨中依然保留有鄧伯生墓碑，碑記上標明鄧伯生原為湖南寶慶府武明州萬安二都鄉人氏，於康熙三十七年（1698）寄居雲南東川府會澤地名挖泥寨生理，於雍正二年（1724）二月初八日過世。其侄鄧儒達以及其他鄧氏後人於乾隆二十七年（1762）為其樹碑。關於鄧伯生的故事中，鄧伯生正是前述隨銅礦業興盛而來到東川的早期漢人移民之一。故事講述在清康熙東川銅礦興盛之時，大批湖廣湘黔之民流入東川辦礦。鄧伯生到東川後發現挖泥寨土質優良，便利用這裡的土燒製鉛罐以供煉鉛之用，深受礦廠歡迎。但隨鄧伯生返回湖南後鉛罐燒製中斷，當地人雖試燒數窯但始終未能成功，東川官府和礦廠只得派人到湖南把他請回。這次鄧伯生邀約其老表林姓、姜姓連同家屬一起來到挖泥寨定居，並將其帶來的先進製陶技術傳給趙、李、尚、錢、蘇姓彝民。鄧伯生因此成為傳授給當地土著製陶技術的燒製砂鍋、茶罐的創始人。⁵⁷

實則在鄧伯生雍正二年（1724）過世之前，東川府尚未徹底歸屬於清政府，亦無大規模銅礦開採，更不可能派專人請鄧伯生回到東川。不過此碑立

⁵⁶ 「徐汝瑄，郡增生，會澤敦仁鄉人。……嘗設館於鄉，以教愚頑，不責修脯，年久無間，里中多所造就。尤好義急公，所居華宜寨有文昌祠，歲奉祭祀，規模狹小，不惜貲財增修闊大，以壯觀瞻。且無苟得，無奔競，非公事足跡不履城市，鄉里皆欽敬之。」
「徐攀桂，字月卿，歲貢生，敦仁鄉華宜寨人。……時夷俗多用火葬，攀桂極力開導，此風漸減。」光緒《東川府續志》，卷2，〈卓行〉，頁19。

⁵⁷ 雲南省會澤縣志編纂委員會編纂，《會澤縣志》，頁559-560。

於乾隆二十七年（1762），彼時正是東川銅礦最為興盛之時期。而鄧伯生的故事將其塑造為較早進入此地的移民，並且由其發掘出此地適宜燒製土陶器皿的優良土質，並教導土著從事與礦業相關的手工藝。由此，「挖泥寨」的名字被凸顯並對鄧氏有特殊意涵。而相關的故事描述則亦為他們進入此地定居發展提供了重要的合理性佐證。

總之，在邊陲之地與中央王朝整合的歷史中，處在帝國邊緣、族群雜處地域內的西南城市景觀，對於具體生活在此地的各方群體而言，地方景觀空間則呈現出更加多元的面貌。在當地彝族的故事當中，文昌宮是由其出資修建並祭祀的信仰空間，對在地漢甲首事而言則是他們易風化俗的展現。而此外鄧姓祖先故事則又賦予挖泥寨以獨特的意涵。在官方菁英版本之外，清代東川府中不同在地群體在彼此衝撞與融合之間，對地方景觀與信念空間交織演變出共建或者競爭的解讀與形塑。

七、結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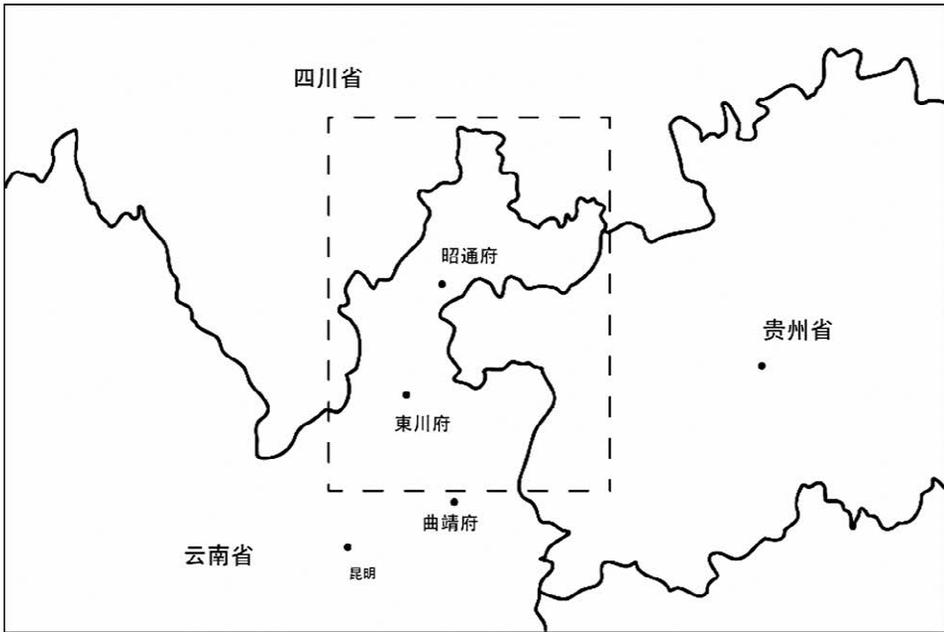
本文以雲南東北東川府的文昌宮移建為例，探討改土歸流後西南城市空間規劃、建築修建過程以及參與其中不同群體對城市景觀的操弄和解讀。同時，東川府移建文昌宮的個案，也回應了 Giersch 對滇南威遠的城市空間的討論。Giersch 觀察到邊陲小鎮中屬於不同群體的建築同時呈現於同一地域空間的現象，特別是代表王朝秩序的文昌宮與傣族廟宇這類看似對立卻又能共存的現象。但地方菁英對景觀以及信仰空間的再造，未必是清帝國自上而下貫徹的結果，而是由地方菁英構建出他們心目中帝國景觀應有的意象。深入觀察地方官員實際的景觀建構行為以及在官方文本中相關描述，則能夠體察更為隱秘的空間佔據過程。原本是本土叛亂族群聚居之處的挖泥寨，被地方官員以風水為名興建了文昌宮，並被改寫為適宜漢人居住之處的「華宜寨」。通過借助所謂風水之名以達到興盛文運的目的，地方官員將相關的文運建築改建在他們心目中適宜的新的地點，使得此處原屬土著的景觀，被地方官員重塑為他們心中屬於清帝國的全新景觀。

此外，Giersch 在此將某一類建築對應某一特定的人群，忽視了同一處建築景觀對於不同的社會群體而言可能具備完全不同的意義。對於同一建築空間以及景觀而言，即使是慣常被認為代表了帝國文明秩序的文昌宮，不同群體對其解讀可能近似，也可能會大相逕庭。清代官方在東川府移建文昌宮並非僅具有興盛文運之意，不同的群體在其自身話語中對其有着不同的訴求和

解讀。城東文昌宮雖然依照地方官員的規劃興建，但實際日常生活中，原有城西文昌宮並未因此荒廢，反而成為近城重要的景觀。不僅對當地文人而言是重要的雅聚所在，對本地民眾而言也具有重要的鎮治水患之靈力。而在當地的歷史記憶中，城東文昌宮成為了護祐本土彝民的信仰空間，並暗喻了土著在此地的早期歷史。同時隨改土歸流陸續進入此地的外來的各類漢人移民，對於他們所生活的地方景觀空間，也衍生出屬於自己的地方記憶。對東川府中的文昌宮並非一成不變的正統表述，其本身因參與其中的各方群體而存在多重複雜的內容。因此，西南邊陲城市空間中所謂不同群體互動的「中間場域」，恐怕較 Giersch 的表述呈現出更為複雜的維度。相關研究不僅應當呈現出不同建築空間在城池中彼此鑲嵌共存的「馬賽克」現象，更應當進一步揭示在日常生活中的各方群體所呈現出的或同或異的景觀認知，方能使我們得以從中窺知改土歸流後西南城池景觀建構較為完整的面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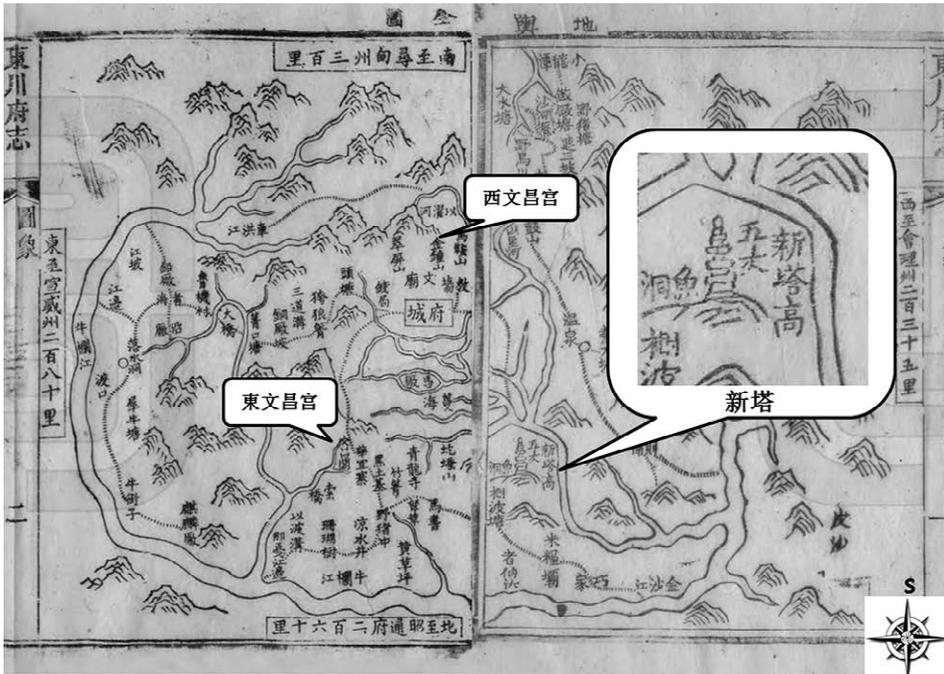
（責任編輯：周驚濤）

附圖1：東川府、滇東北以及雲南、四川、貴州三省交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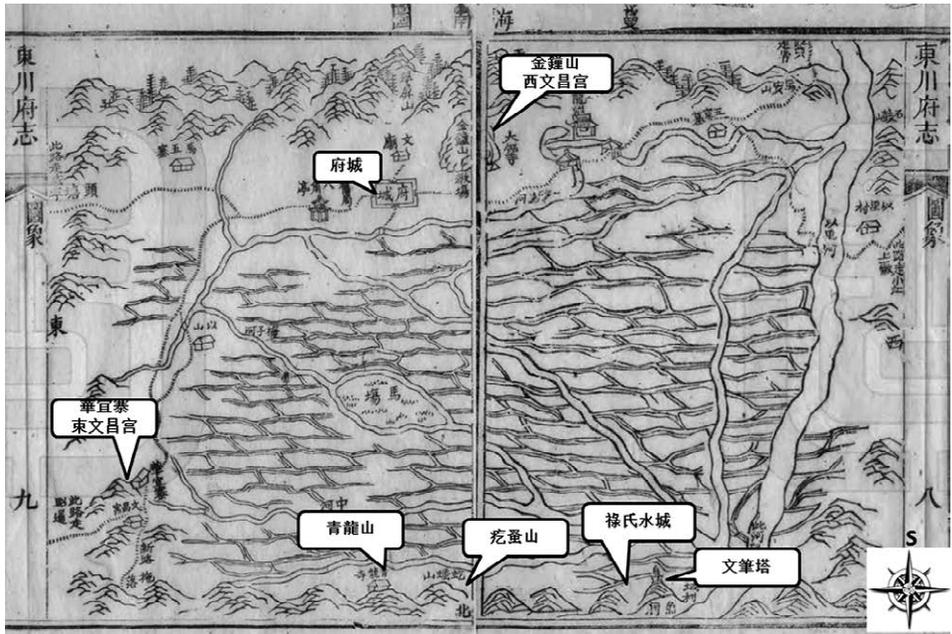
地圖來源：譚其驥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社，1987），第8冊，頁48-49。

附圖2：東、西文昌宮以及新塔



地圖來源：乾隆《東川府志》，卷1，〈圖象〉，頁1-2。

附圖3：蔓海全圖



地圖來源：乾隆《東川府志》，卷1，〈圖象〉，頁8-9。

Reshaping Landscape and Contesting Space: The Relocation of the Wenchang Temple of Dongchuan Prefecture, Yunnan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Fei HUANG

Centre for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Sun Yat-sen University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stract

The physical landscape of Dongchuan prefecture in Yunnan province was transformed as the region was incorporated into the Qing empire. After administrative regularization (*gaitu guiliu*) ended the power of indigenous chiefs, the landscape was remade by local officials and elites who saw themselves as acting on behalf of the Qing state. Old and new understandings of landscape and ritual space co-existed and contended.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relocation of the Wenchang temple in Dongchuan Prefectur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s a case study of a historical process in which physical structures associated with local scholarship and literati culture interacted with social reproduction of different groups. New ritual spaces and landscapes were constructed by officials, but they were understood, represented and remembered in different ways by different local social groups according to their own socio-economic situation.

Fei HUANG, Centre for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Guangdong Province, P. R. China;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lear Water Bay, Kowloon, Hong Kong. E-mail: faye712@gmail.com.

Official and elite representations were not simply accepted universally. Rather, different groups in local society in Qing Dongchuan developed their own differentiated interpretations of the local landscape and ritual space.

Keywords: Dongchuan prefecture, Wenchang Temple, administrative regularization (*gaitu guiliu*), landscape